

学习材料

第十二期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编印

一九七二年九月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目录

要善于进行比较

.....安 群 (1)

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指针

——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金 灿 (8)

是政变的历史，还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纪一闻 (17)

批判在“政变”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

.....李连实 (22)

帮凶的颂词 反党的铁证

.....复旦大学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33)

批判大毒草《论短促突击》

.....昆恩文 (40)

要善于进行比较

安 群

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也是真理发展的规律。我们在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中，在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比较方法，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提高社会主义觉悟。

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教育，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摆事实、讲道理的一个传统方法。毛主席在《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按语里指出：“这篇文章里所描写的‘四对比、五算账’，就是向农民说明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使人一听就懂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多年来，我党在对党员、干部、群众进行教育中，采用了多种行之有效的比较的方法，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

忆苦思甜，回忆对比，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比较法。我们都还记得，在革命战争年代，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就是通过对自已亲身经历的新旧生活的鲜明对比，启发了阶级觉悟，认识了革命真理，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武装斗争。正是通过回忆对比的教育，他们深深懂得为什么而战斗，为谁而战斗，因而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能立场坚定，勇往直前，为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经常忆苦思甜，回忆对比，

使广大革命群众从亲身经历的变化中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也使那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年青一代，了解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懂得应该怎样保卫和建设得来不易的社会主义江山，当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忆苦思甜，回忆对比，还有效地帮助了少数忘了本的阶级兄弟幡然醒悟，重新振奋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自觉地克服缺点和错误，回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为革命立新功。

在进行正面教育的同时，接触反面材料，研究反面教员，进行正面和反面的比较，展开对立面的斗争，这又是一种我们常常使用的比较方法。毛主席强调指出：“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党在历次重大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总是在着重地引导革命群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把反面的东西公之于众，让群众通过比较、鉴别，自己动手批谬论，锄毒草，将毒草化为肥料，提高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例如，在历次思想政治路线上的重大斗争中，我们党曾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资产阶级右派的言论、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谣言和诡辩等反面材料公布在广大群众面前，进行群众性的讨论和批判。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论战中，除发表正面的批判文章外，我们还在报刊上刊登过现代修正主义的种种谬论，刊登过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华文章。人民群众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和鉴别，结果怎样呢？和阶级敌人的主观愿望恰恰相反：

不是他们的谎言欺骗了人民群众，而是人民群众揭穿了他们的画皮；不是由于他们的攻击而否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是人民群众更加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

抓先进典型，树革命样板，开展表扬和批评，进行先进和落后的比较，这也是我们经常使用的比较方法。例如，我们学习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英雄人物，学习大庆、大寨等先进典型，使我们的党员、干部和群众通过比较、对照，找出自己的差距，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自觉地继续革命，不断前进。同样，我们抓住落后的或错误的典型，加以揭露，也是让人们通过比较、鉴别，更好地发展先进的和正确的东西，克服落后的和错误的东西。

广大群众对比较的方法有丰富的经验，切身的体会，他们用许多生动朴实的语言称赞这种方法，如：“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比比看看，好坏自见”，“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不比沾沾自喜，一比相差万里”，等等。

科学的比较的方法，为什么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起到这样明显的作用呢？这是因为它是符合人们认识运动的客观规律的，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包含着互相矛盾的对立面。“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有真的、善的、美的东西，就必然有假的、恶的、丑的东西，有革命的、进步的东西，就必然有反动的、落后的东西。比较的方法，就是承认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通过互相矛盾的对立面的

比较，认识事物的本质和特点，进而用真的、善的、美的去克服假的、恶的、丑的，用革命的、进步的去克服反动的、落后的。因此，科学的比较的方法，体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路线，这种比较法也就是唯物辩证法。

毛主席指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把互相对立的事物放在一起比较，把事物内部客观存在的矛盾充分暴露出来，具有很大的鲜明性，谁好谁坏，是真是假，泾渭分明，一清二楚。这样就能使人感奋起来，进而在分析中间，在鉴别中间，在斗争中间，取得比较完全和正确的认识，促使真理战胜谬误，先进克服落后，促使矛盾向有利于革命的方面转化。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们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也必须通过斗争。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机会主义分子总是用谣言和诡辩来欺骗群众，蛊惑人心。要戳穿这伙骗子的伪装，就必须把谣言和真理拿来对比，把假象和事实拿来对比，以便从他们变幻不定的形象中看清其反动本质，看清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根本分歧，使马克思主义这个革命的批判的武器，日益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所运用，成为行动的指南。当我们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从本质上揭露修正主义观点的谬误时，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也就深入了一步。经验证明，比较的方法是认识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好方法，是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好方法。

有的同志在看问题、想问题的时候，并不是正确运用唯

物的辩证的比较方法，而是把一些表面的、片面的现象拿来作简单的类比，不对事物作深入的分析，因而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不仅不能使人们认识真理、抛弃谬误，反而会象诡辩术那样，把人们引向邪路。

能不能正确运用比较的方法，这不单纯是一个方法问题，是同我们每个人的立场、世界观联系在一起的。立场、世界观不同，比较的出发点、比较的内容、比较的标准、比较的结果也就大不相同。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社会生活方面最本质的问题。对事物进行比较的时候，就是要抓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个纲，要进行阶级分析。要看看这个或那个事物究竟是为哪个阶级、哪条路线服务的？是对哪个阶级、哪条路线有利？譬如说，如何看待战争。如果没有正确的立场和正确的标准进行比较，就会笼统地认为，战争的双方，都是使用武器造成人的死伤，都是不对的，因而不能正确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革命战争与反革命战争，不能认清战争的实质。又譬如，如何看待所谓自由、民主。如果没有正确的立场和标准加以比较，就会被一些假象所蒙蔽，就会看不清问题的本质。但是，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进行阶级分析，就很清楚地看出，资产阶级的“自由”只不过是他们随心所欲地剥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自由；他们的“民主”只不过是用皮鞭和刺刀强迫人民顺从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剥夺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才享有了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因此，不能抽象地谈论自由、民主，而要弄清究竟是哪个阶级享有的自由、民主。离开了阶级分析，离开了阶

级的功利标准，就会越比越糊涂。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为我们规定了政治生活中判断是非、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样，“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从这里深刻启示我们，对事物进行比较、鉴别的时候，掌握正确的标准是很重要的，只有牢牢地掌握无产阶级的标准，才能比较、鉴别事物的本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才能促成事物向有利于革命的方面转化。

再拿革命同志之间的比较来说，同谁比、怎样比、为什么比，这里就有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就有一个正确的比较内容与比较标准的问题。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要求，比是为了学先进，超先进，促后进，帮后进，后进变先进，先进更先进。这正是唯物的辩证的比较方法。因此，我们要把自己的思想同代表历史发展潮流的先进思想比，同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比，同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比。这样，才能比出差距，比出干劲，比出方向；才能通过比较，克服我们思想肌体上有害的东西，树立起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品质。这样的比较，是积极的，有益于人民，有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与此不同的是另一种比较方法。譬如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么比，就会使自己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甘居中游，满足现状，右倾保守，其结果，中游也是保不住的，往往造成落伍掉队。“以己之长，比人之短”，这么比，不仅比不出客观真理，而且会蒙蔽自己的眼睛，把自己看成一朵花，把别人当作豆腐渣，就会摆错个人同党、同群众的位置，甚至会在政治上造成严重的恶果。这种比，都是一些主

观唯心论的比较方法，因而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相反，却会引导人们一步步陷入错误的泥坑。至于同别人比职位、比待遇、比享受，这种“比”，更是消极的，可鄙的。这种“比”，是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它对革命队伍起着腐蚀瓦解的作用，对革命团结起着破坏的作用。这是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的。

列宁指出：“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比较方法的问题上，同样存在着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让我们遵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运用唯物辩证的比较方法，来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吧。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九期）

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指针

——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金 灿

一九三六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光辉著作。它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总结。在这部著作里，毛主席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强调指导战争的路线一定要符合客观规律，把研究战争规律作为制定战略战术的出发点，坚持了在战争问题上的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了唯心论的先验论。

毛主席说：“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这是我们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

战争是物质的运动，是阶级社会的历史现象，它同世界

上其他事物一样，有其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臆造。它是战争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地理诸因素的内在联系，决定着战争发展的总趋势，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我们从事革命战争，就要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性。不懂得革命战争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一切战争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域，同一定的作战对象，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战争和战争之间既有相同的情形，又有不同的情形。这种相同的情形，构成了一般战争或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比如进攻和防御是基本的战斗形式，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作战的目的等，这对于一切战争都是适用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种不同的情形，就是一战争区别于另一战争的特殊的矛盾，它构成了这个战争本身的特殊规律。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中国的具体环境、具体条件下进行的，比较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中国革命战争又有自己的一些特殊规律。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就必须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我们党进入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时期。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产生了若干小块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小部队，不断受到敌人的“围剿”。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应当怎样应付敌人，怎样作战？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革命战争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具体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

四个主要特点，即：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规定了红军既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又不可能很快发展和很快战胜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如果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它说明，中国革命战争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我们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都必须从这些特点和规律出发。毛主席在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反对了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批判地吸收了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对于我们有用的东西，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制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指导路线和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歼灭战等一系列正确的作战方针原则，引导中国革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

毛主席说：“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是毛主席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后发制人，以小敌大，以弱胜强的根本指导思想。它把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争运动的基本形式辩证地统一起来，做到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紧密结合，防中有攻，防是为了攻，攻防交替运用。它通过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歼灭战等一系列战略战术的正确运用，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使我在战略上完全掌握主动，迫使敌人由全体上的优势变成劣势，由战略上的进攻变成防御，我即以战略反攻和进

攻，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向敌人实施战略追击，直到彻底消灭敌人，赢得战争的胜利。

毛主席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和一系列作战的方针原则，充分体现了以退为进，以防为攻，化敌为弱，变我为强的革命战争的辩证法。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同时又是主观指导能力的竞赛。毛主席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红军处在强敌进攻面前，不是凭借“弱”来打败敌人，而是在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使自己变成强者，从而战胜敌人。敌我之间的优势和劣势、主动和被动、进攻和防御等矛盾着的状态，并不是僵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可变的，是可以在战争过程中，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的。实现这种转化，决定于指导方针的正确和主观的努力。实行积极防御，就是把防御当作转化敌我力量对比的手段，使我由防御转入反攻和进攻，彻底歼灭敌人。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时，从战略上、全体上看，敌是多兵外线进攻，我是少兵内线防御；敌强我弱；敌主动，我被动。但是，在毛主席军事路线指引下，我采取先诱敌深入，后战略反攻的方针，在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在战役和战斗上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集中数倍于敌的兵力，打敌一部，再及其余，各个击破。这样，在战役战斗上、局部上，我变成了强者，敌变成了弱者，我主动，敌被动，从而逐步地从整体上改变原来敌强我弱的态势，改变

在战略上敌主动、我被动的地位，实现整个形势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面转化，然后再实施战略反攻，大量歼敌。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毛主席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取得的。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根本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规律，不懂得革命战争的辩证法，反对毛主席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主张并推行消极防御。“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他们否认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实行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红军的“正规”战、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主张“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诬蔑为“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要“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同敌人“拚消耗”；最后，变成了逃跑主义。这样，就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被迫进行长征。这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实行消极防御所产生的恶果。

在战略防御中，实行有计划战略退却，即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打，这是我们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必须采取的战略步骤，历来是我们战胜敌人最有效的军事政策。毛主席说：“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诱敌深入，一是有理，

二是有利。把敌人放进来，使全国以至全世界都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是敌人来进攻我们，不是我们去进攻他们。我们就能广泛动员人民用各种各样的行动参战，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有计划地诱敌深入，可以使我军主力相应地集中，进行机动作战，选择有利战场，迫使敌人就范。它可以使敌人忘乎所以，发生错误；分散兵力，背上包袱；疲劳沮丧，到处挨打。这样，敌人的弱点就充分地暴露出来，我们的长处就能充分发挥，怎么打有利就怎么打。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反对诱敌深入，鼓吹什么“短促突击”，充分说明他们不懂得革命战争，尤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敌人堡垒主义作战方法的进攻面前，畏敌如虎，既不敢实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又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相反地，他们捧着消极防御当宝贝，把兵力分得很散，强使红军在敌人的堡垒前面，构筑工事，对推进筑堡的敌人以短促的突击，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同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消耗战，企图用防御来“顶”住敌人。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单纯防御路线，是彻头彻尾的军事保守主义。其结果完全使自己丧失主动，丧失歼敌的机会，既不能保存自己，也不能消灭敌人，不仅没有打破敌人的进攻，反而被敌人所打破。这种所谓“短促突击”，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军事上的其他错误一样，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毛主席把我军的战略战术高度概括为四句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我国无产阶

级在武装革命斗争中的科学创造，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深刻体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时机不成熟，我主力不同你硬拚，而同你脱离接触。等到我能吃掉你时，就集中三个师、五个师，吃你一个师，吃掉一个，再吃一个，一口一口地把你吃光。打得赢我就把你吃掉，打不赢我就走掉。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一切战略战役计划，都是建立在打这个基本点上。毛主席指出：“运动战，还是阵地战？我们的答复是：运动战。”打运动战，就能使我主力部队在广阔的战场上，高度地机动，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迅速地集中和分散，捕捉有利战机，出其不意地歼灭敌人。毛主席又指出：“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出于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的需要，对于某些战略要点和重要阵地的坚守，对于敌人某些设防阵地和据点的攻击，都是应该承认阵地战的。但不是采取一般的阵地战，或者把阵地战和运动战同等看待。长征途中，由于王明路线的逃跑主义，中央红军受到严重削弱，而又面临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处于很困难的境地。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毛主席亲自指挥红军四渡赤水，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寻找战机，大量歼灭敌人，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渡过金沙江，粉碎了敌人妄图歼灭我军于川滇黔边境的反革命计划，使红军转危为安，为完成震惊中外的长征，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战，是我军作战史上的光辉典范。

恩格斯指出：“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